



裴毅然教授序

釐清历史，记录苦难

很早就知道武宜三先生在从事一项大工程，没想到他耗十余年之力，不惮细屑、不畏耗时，为当年的右派、中右、右倾等各类分子树碑立传，完成这部数字版的《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》（下称《大辞典》）。工科出身干文科重活，无资助、无助手，默默独行，当然只能靠一股精神——釐清历史，记录苦难。

1957年的反右运动——是毛泽东及其一伙祸国巨罪之一，是一段尚带体温的历史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右派分子“人还在，心未死”，他们当然挣扎着要为一生苦难留下记载，为这场赤难刻石勒碑。难道能让肇祸的“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”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人？难道能让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，就这么随风飘去？难道能够默认中共的“淡化”，就这么咽下一生的苦难？当然得让“毛主席、党中央”为犯下的罪行缴纳一点“补偿”，得让至今尚未忏悔的中共长跪在百万受难者之前，历史当然得由人民书写！

抗美援朝、反右运动、三面红旗、三年大饥荒、黑色文革、六四屠城，都是中共最不愿面对的历史污点，最不愿被提及的罪恶“伤口”，事关政权合法性、栓系“伟光正”形象呵！好了，套用毛泽东的语气来说：凡是他们反对的，我们就得拥护；凡是当局竭力淡化的，人民就必须重视；凡是当权派不愿说的，老百姓就“年年讲、月月讲、日日讲”。

人民书写历史，实践检验真理，历史辨别马列，灾难揭穿谎言。《大辞典》虽然暂时只收集到三万多右派个案，但已足够呈现当年的灾难。1949--1976年的所谓毛时代，可有一件站得住脚的事？尽管有马列误导客观原因，但失信天下、自毁诚信的“阴谋”总挂不到马恩列斯，也赖不上美蒋反动派吧。

1957年赤难，毛泽东固然为统帅、邓小平为副帅，刘周朱陈彭，也是投了赞成票吧。罗马不是一天造成，反右亦非毛一人所为、所能为。

当然，中共之所以肇祸连连，最大致因在于那张红色图纸——共产主义，以为循此径可入天堂，结果拐进地狱。1957年的反右运动，既是国际共运由盛转衰的拐点，也是国人真正开始认清毛共嘴脸的起点。先鼓励鸣放、引蛇出洞，后问“这是为什么”、聚而歼之，居然还好意思说是“阳谋”，能与中共讲理吗？从逻辑上，1957年的翻脸“坑儒”乃是1989年开枪屠城的先导。

《大辞典》中一个个可怜的右派分子、一条条被伤害被侮辱的生命，一块块无边无垠的墓碑，他们不应该要向中共讨回公道吗？无声如有声，中共政权伤害了这么多人，你的“为人民服务”呢？你的“伟光正”呢？你的合法性呢？

《大辞典》资料丰沛翔实，笔者一直关注的“三八式”、“解放牌”受难者，悉数收入，十分方便查阅搜索，省我相当气力。治史研赤，资料第一呵！相信有兴趣者会像笔者一样，作为工具书，收藏备索。

《大辞典》收录不少隐秘掌故，如大名鼎鼎的李淑一（1901--1997），差点被“错划”，都已内部定案，只等宣布了，恰毛泽东寄来《蝶恋花·游仙》（我失骄杨君失柳），湖南师院几位学生来访，得知毛词，一时传颂，中共长沙十中支部才悄悄撤下材料。文革之初档案外泄，李淑一才知自己是“漏网右派”。

钱钟书之父钱基博（1887--1957），居然也是右派分子，不及戴帽批判即死去，全校大会上由儿子钱钟书和女婿石声淮捧着灵牌接受批判；弟弟钱基厚字孙卿，女婿石声淮，也是右派分子。

文革悍将、金棍子姚文元（1931--2005）也是“内定右派”，全靠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书记秦昆力保，才留下宝贵的“政治生命”。

有恩于中共的“西安事变”功臣于学忠（1890--1964）乃中右分子。北大青年助教乐黛云（1931--）也光荣沦“右”，后跻身“国家领导人”的荣毅仁（1916--2005）也差点成为右派分子……

1957年10月19日公安部大会，罗瑞卿批斥开枪自杀的右派分子谢光（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主任）说：

谢光也是研究室的，其人已不在人世，他自己给自己做了结论。他是死右派，不甘心改造。历史上也有问题。这样的人，死了毫不可惜，对右派心不要那么软，因为对他们心软一点，他们就会反过来对人民心硬心狠。

让人想不到的是，气焰熏天、志得意满的罗瑞卿会在1966年3月18日跳楼自杀，大辞典主编武宜三问道：“不知道罗瑞卿当时是否想起自己说过的这几句话？”这不就是轮回、这不就是报应吗？

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季音（1932--），1940年入党，曾被关过上饶集中营，资格不可谓不老；行政11级，地位不可谓不高；1957年写了大量反右“新闻”，如《肮脏的一群——记上海右派集团几个主要人物的一些“旧帐”》等，批判学者沈志远、报人陆诒等。可是当他为老战友、右派分子刘敬坤向柯庆施辩白时，马上由反右积极分子变成右派分子，送到农场去劳改。

许多右派分子，其实都是左派分子，都是反蒋英雄，都是剿匪、土改、镇

压反革命、三反五反、批评胡适、批判胡风、肃反等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。

虽说中共犯下巨罪，仍不能以文革笔墨还治其身，还得摆出事实，以史料为依据，以事实为准绳。武宜三先生所开始的《1957年受难大辞典》，正是这种值得致敬的工程——用生命与中共说理、用事实与摆说红色政权的合法性。

《大辞典》展现的仍然是“革命吃掉自己自己的儿子”的血淋淋事实。

《大辞典》将留给后人无穷的思索。

我想，这也许就是《大辞典》的意义所在！

裴毅然 2019年1--2月于 Princeton

（裴毅然，1954年生，浙江省杭州人，复旦大学文学博士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、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。）